

目 录

我与梅贻琦	韩咏华(1)
梅贻琦先生与清华大学	黄廷复 孙敦恒(8)
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郑天挺(26)
一代画师——忆吾师徐悲鸿	张安治(31)
田汉的童年	田海男(56)
邵飘萍传略	杜钟彬(88)
邵飘萍采访新闻轶事	宋北风(95)
苏曼殊的生平	黄忬华(98)
刘大白事迹述要	陈于德(104)
五四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	王庆华(113)
管翼贤与《实报》	窦以锐(124)
早期的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王道元(128)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上)	清华大学校史组(135)
我所知道的京剧富连成科班	万子和(153)
中华书局历史点滴	徐秀成(171)
评剧的起源	徐存甫(177)
雕塑艺术生活漫忆(二)	刘开渠(180)
我和明月社(下)	黎锦晖(206)
我的舞台生活(三)	袁世海(247)
《文化史料》第一辑至第三辑目录及第五辑篇目预告	(271)

我与梅贻琦

韩咏华

一、家世与婚事

梅先生名贻琦，字月涵，一八八九年生于天津。他们这个梅姓，据家谱上说，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清朝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到他这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近照

(在其北京住宅阳台上)

一代共有兄弟姐妹十人。他在弟兄中排行老大。他父亲虽考取了功名，但始终不得志，家境清苦，失意之下，常吸鸦片烟。

梅先生一九〇九年考取清华第一批官费留美。十月到美国，次年入美国吴士脱工业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五年后回国。出国前，家里给他定了婚。回国后，看到家里困难，他就毅然退婚，单身工作好几年，担负着养家的重任。甚至成家之后，还拿出薪

水的三分之二赡养父母，照顾弟妹。直到三弟贻琳做事之后，帮助一点家里，情况才稍许好转。

说起梅先生和我的婚事，还得先说说我的“家世”。我们韩家原籍安徽。前十代搬到天津。梅先生的叔祖和我祖父是世交，因此，我们彼此熟悉。我父亲与严修（严范孙）先生也是世交。我们家里房子不够住，父亲向严老借房住，一住就是十几年。我们弟兄姐妹七人，都在严老门下读书，是严老培养起来的。我十三岁上幼稚师范，十六岁毕业后在幼稚园当教员。哥哥振华留日归国后主张送我到金陵去继续读书，父亲不同意，说是严老培养起来的人，应给严老效力。于是我在幼稚园工作了八年半。

再说梅先生刚回国时曾在基督教男青年会当过干事。当时我在女青年会当学生干事。我曾去邀请过梅先生来女青年会演讲，并劝他妹妹到女青年会来参加活动。后来直到在清华任教的几年中，有替他保媒说亲的，他概不为所动。据他兄弟说：“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直到他快三十岁的时候，经严老先生从中介绍，始与我缔结婚约。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经过，仍觉得有趣。当时，严老先生先跟我父亲谈，后又跟我哥哥谈，最后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梅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由同学转交给我。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写回信。不久后梅先生又给我的同学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我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父亲竟因此同意了。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

我们于一九一八年订婚，一九一九年结婚。婚礼在北京东城

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由牧师证婚。我们的婚礼在当时是很新式的，家里有人不满意，纷纷批评。因为我上边的哥哥姐姐都是旧式结的婚。

二、家庭生活

婚后，我在家当家庭妇女。八年半中生了六个孩子。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孩子们带大。梅先生在家里很少说话。关于公事，更是一句也没有。对孩子们的教育很注意，从小不让他们挑吃。吃饭时，一个孩子一个盘，把菜分给他们，说：“你们把自己盘里的菜都吃完，喜欢吃的，爸爸再给你们添，不喜欢的就不给了……”孩子们觉得条件不高，就把分给的菜都吃掉，从小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因此，他们都能适应后来在昆明那段清苦的生活。

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我在清华大学旁听了英文、日文和逻辑，前后共两年。那时我已四十岁了。后来在国外，甚至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还在夜校念英文。梅先生对我像对我们的孩子一样，十分民主，愿意工作就让你工作，愿意念书就让你念书。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一九三八年我们把家搬到昆明。那时清华已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梅先生与蒋梦麟先生（北大校长）、张伯苓先生（南开校长）组成联大常委会。在昆明这一段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三位常委的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人后己吧。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有很多教授的夫人要做一些零活。我也和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自制一种名叫“定胜糕”的上海点心。糕是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并准

备其它原料，我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我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去寄卖。冠生园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的皮鞋，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这段日子是够苦的。但是我们选了“定胜糕”做为我们生产品的名字，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 希 望 和 信念。我把卖“定胜糕”得的钱，给两个大孩子每人六十元，读中学的每人二十五元，最小的也给五元，让他们添置学习用品。后来，梅先生很觉不安，因为教授夫人们孩子多，家务忙，顾了做零工，就顾不上管家，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以后由清华工学院为驻华美军承担设计，建造房子，得了钱分给教职工贴补生活，大家的日子就过得好一点了。

抗战胜利后，三校同人准备迁回京津。做过零工的教授夫人们，又在昆明街头摆起“地摊”，处理用不着的和带不走的 东 西，有旧衣、椅套、毯子和各种日用品。虽然还是“摆地摊”卖东西，但抗战胜利了，比起当年做糕时的情景，真是别有一番喜悦在心头了。

胜利回北京时，我带大女儿祖彬和女婿经上海到北京。后来女婿又取道上海到美国去。当时祖彬留在清华大学，任英文助教。

三、离 开 大 陆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征集青年学生担任军 事 翻 译 员时，西南联大很多学生响应了。我的儿子祖彦也报名参加了。当时他在联大机械系二年级读书，成绩不错。老师认为他放弃学业从军很可惜，可是梅先生却没有阻止他。梅先生对自己的孩子，也像对他的学生一样，从不勉强，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而是让他们自己去选择道路。这样，祖彦在译员训练班受训期满后，又在云南边境战地当了一年随军翻译，以后又到美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留在美国念书了。

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国外，我怕大女儿祖彬与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先生商量，决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带祖彬及她的两个小孩搭亲戚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之后不久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

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奔波着。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梅先生飞抵纽约。以后，在华美协进社内设立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一九五五年台湾请他去当“教育部长”，并筹建新竹清华原子反应堆。十一月梅先生赴台。

我没跟他去台湾，而是自己留在纽约。我是一九五一年携带两个外孙由香港去到美国洛杉矶，又转往纽约的。六十二岁时，我开始找工作。我在衣帽工厂里做过工，在首饰商店里卖过货，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我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

一九六〇年梅先生患骨癌病重，我赶到台湾去看他。他住在台大医院。我白天去病房里陪护，晚上住在设在台北的清华办事处。这样，我陪了他两年。

梅先生病危的时候，胡适之先生劝他写一个遗嘱。他不作

答，显得有些不高兴。胡先生把此事告诉我，我说请贻宝弟劝劝他，因为他平时最听这个兄弟的话。但经贻宝劝说，他也没采纳。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梅先生在台大医院逝世。

梅先生在台湾病时的治疗费和住院费都很高，台湾当地的“教育部”和新竹清华大学都不能开支这笔费用，于是先记账。他逝世后，治疗费、住院费以及治丧费都从前几年他七十寿辰时清华在美国、香港和台湾校友赠的寿仪里开支。



一九六二年梅贻琦先生在台北医院中
(后左夫人韩咏华，右女儿梅祖彬)

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情况下（当时我也在场）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在场的人都很感动。后来我想，他没有个人的财产，所以也无须写什么遗嘱。

四、关 于 回 国

我的儿子祖彦，于一九五四年取道巴黎，通过亲友的帮助，在人民政府安排和资助下，辗转回国。

至于梅先生，记得当他常来常往于美、台之间的那段时间，国内有一位朋友（教授）曾写信请他回国。看了那封信后我问梅先生：“你看共产党怎么样？”他说：“把国家治理得不错。”但最终他也没有回来。据我想，他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顾及面子，觉得不好行动。

最后，我自己回国来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教育界很多同人都回国来访问。我想，“大家都回去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回去看看？”梅先生故去以后，我自己没有立家，而是跟着两个女儿过。家事不多，也没有什么负担，并且儿女之中还有在国内工作的，我也想看看他们。这样，一九七四年夏，我就回国来探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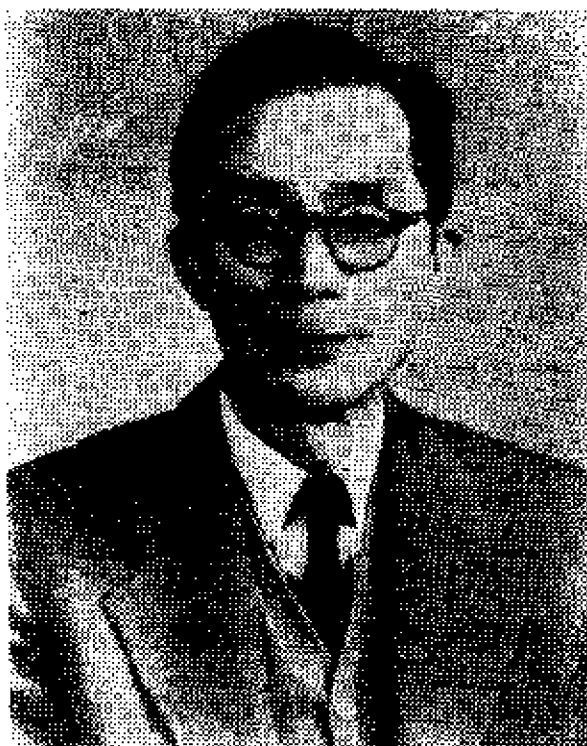
这次回国探亲，见到了无数阔别多年的亲戚朋友，而且有幸能和邓颖超同志会面。在会见时，我表示了愿意回国定居的想法，当即得到了邓大姐的支持。因此，在那次返回美国后，我就向驻美联络处提出回国定居的申请。

一九七七年春，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申请得到了批准。当年夏天，就重新回到了祖国。我回国后，政府给了我优厚的生活待遇，还特邀我为全国政协委员。几年来，住在英、美的几个女儿女婿们，也曾先后回来探望，和我团聚。我的晚年生活可说是很美满的。只因年纪过高，未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总是深觉遗憾。

（一九八二年四月廿七日于北京）

梅贻琦先生与清华大学

黄延复 孙敦恒



梅贻琦先生像

梅贻琦，字月涵，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生于天津鼓楼西板桥胡同。曾祖汝钰、祖茂先，父臣（字伯忱）。天津梅族最初是于明成祖时由江苏武进北迁来驻防天津卫的，到了清朝末叶，家道中落。庚子之乱，梅贻琦曾随父母至保定避难，乱后返天津时家产已被洗劫一空。

一九〇四年，严范孙与张伯苓在“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创办敬业中学堂（一九〇七年改名南开学校）。梅贻琦是年十五岁，入该校第一班就读，成绩优异，为张伯苓氏的得意门生。一九〇八年毕业，名列第一，被保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翌年，清政府“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一批庚款游美学生，梅贻琦以平均七十五分的成绩考中（名列第六）。一九〇九年十月赴美，翌

年春入吴士脱工业大学 (Worcester Polyte Chnic Institute) 习电机专业。在校期间，勤学奋勉，曾把撙节下来的“膏火”聚少成多，寄回贴补家用。一九一四年，梅贻琦从吴士脱大学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因其在校学习成绩一贯优异，曾被选入“Sigma Xi”荣誉学会（美国一种奖励学术上有成就的大学生的组织）。在美期间，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士脱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务。一九一五年春，梅贻琦回国。初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书记。九月，应清华学校之聘来校任教。初教数学、英文，后专教物理、由教员而讲师而教授。因他学识广博，曾被公认为“科学各教授的首领”。除上述正课外，还主讲过测量、工程事业（土木、机械，开矿、电机）、运输等副课，还讲演过《洋灰制造法》、《矿地设备》、《电子学原理及X光射线》、《爱因斯坦学说》等专题。在此期间，他还表现出对教育事业广泛的热情和志趣。到校后四个月（一九一六年春）他即与其他教师一起主持高二级关于教育问题的辩论会，辩题是《对于现在之中国，雅典（普通）教育方针较斯巴达（人材）教育方针为合宜》。他还当选为成府贫民小学董事。此后直到一九二六年他任清华教务长止，先后担任过“唯真学会”顾问、清华童子军团长、军长、总司令以及全国童子军理事长、教员学术研究会书记、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高等科英文、文学辩论会委员、西文编订课程委员会委员、科学社顾问及名誉社长、大一课程工业部主席、改革校务调查委员会委员、基金调查委员会委员、学程委员会委员、建校十二周年纪念委员会委员长、华员大学会书记及交际组主任、《周刊》特载栏编辑、德育委员会委员、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新校委会议教员代表、大学教育方针

委员会委员、学校改组委员会委员等。在校外，他曾与陶行知、曹云祥（清华学校校长）等一起组织“中国科学教育促进研究会”，任管理部书记。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利用休假时间再次赴美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物理，并曾一度任纽约大学讲师。一九二二年“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国，继续在清华学校任教。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一九二六年春，教务长张彭春辞职，学校由“挽张”而掀起一场“改进校务”的浪潮，成果之一是从这时起，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直接指派，而由教授会公举。四月，梅贻琦作为物理系的首席教授而被公举为改制后的首任教务长。在两年的教务长任内，他初步显示出其办学才略。他着手把新建的大学部做了必要的改组和调整，使它真正成为一所正规而有特点的大学的雏形。清华之设大学部，早在一九一六年周诒春校长任内即有拟议，到一九二五年（曹云祥校长任内）始行实现。但初设之大学部各方面都显得不完备和不正规，学制上只笼统地划分普通科和专门科两科，学习年限各定为二年或三年，学生们认为培养目标不明确，不文不理，与国内一般大学亦不相衔接。梅贻琦任教务长后，首先把两科制改成学系制，即结合社会需要和学校特点，设立国文、西文、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心理、农业、工程、数学、哲学、社会、体育、东方语言、音乐等十七个学系，并把全校教师按学历与专长分为教授、讲师、教员、助教分别部署各系，制定了新的组织大纲和学程大纲。这期间，他还发表了《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赠别大一诸君》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他在大学教育方面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针。

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入控北京，清华学校亦被

接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温应星随同奉系军阀的倒台而辞职，南京政府电委教务长梅贻琦暂代校长职务。八月，罗家伦受命接任清华大学校长。十一月，因清华的驻美机构——清华学生留美监督处财务上发生混乱，梅贻琦因素称公正廉洁，被派赴美接任留美监督一职。罗家伦就职不久，即以种种表现失去师生的信任。一九三〇年五月，学校掀起一场声势颇大的“驱罗”风潮，罗家伦被迫于五月二十二日辞职离校。这时，在“中原大战”中暂时得势的阎锡山，乘机想安插乔万选（一九一九级清华校友，晋籍）充清华校长，上任时被师生拒于校门之外，清华再一次出现长期无校长的局面（这一次是连续十一个月）。一九三一年四月，当时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亲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为清华校长。吴南轩四月到校，五月即爆发“驱吴”运动。五月廿八日，清华教授会通过决议，谴责吴南轩“唯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员为雇员，”要求教育部“另简贤能”，并发表声明说：“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全体教授定于下学期与清华脱离关系”。学生自治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要求“撤换吴南轩，由全体同学整队至校长室，请其即时离校。”吴南轩携带清华印鉴逃往城内使馆区“避难”，并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招牌，师生对这种“托庇于帝国主义之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国家尊严”的行径，愈加愤慨，召开紧急大会，组成“护校委员会”，表示“倘若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吴南轩终于被迫于七月辞职离校。学生会随即发表清华校长人选的五条标准：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

吴南轩走后，当时教育部委托清华地理系教授翁文灏代理校务，翁又常“因事赴京”，便转请当时任物理系教授的叶企孙代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时局动荡，学校事务更趋复杂，翁、叶迭呈教育部请辞，叶企孙在一份电文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孙从十月起，决不再负兼代职务。”就这样，经过一再周折和淘选，一位合格的，能为各方面乐于接受的清华校长终于“应运而生”，这就是梅贻琦。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当时教育部令梅贻琦接任清华校长，他交代完留美监督处事务后，十一月末返国，十二月三日到校视事。当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从此，他信守“上承政府当局之指导，内有全校同仁之辅助，外获校友诸君之策励”的治校方针，终于彻底结束了旧清华迭次发生的校长地位不稳的局面，一直任职至一九四八年为止。一九四八年，学生自治会出版的“清华年刊”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民国二十年，当国难临头的时候，十一月国府任命梅贻琦先生为清华校长，‘奉命于危难之间’辛苦经营，使清华能在国家民族大动荡的十七年中保存元气，有所贡献，皆先生之功。”

梅贻琦接任校长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个多月，当时校内校外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作为大学校长，首先必须在这方面表明自己的态度。十二月三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说：“中国现在的确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我们要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时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即当“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之际，他在学校举行的国耻纪念会上说：“……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于

对敌，何等令人失望。但东北虽亡，东北人心未死，东北义勇军随地进展活动，不时抵抗奋斗，使敌人时起恐怖。有此民族精神在，则东北或将不致终亡。”这期间，每有机会，他必告诫学生“不忘国难”，当时全校性集会的内容，几乎全谈的是抗日问题、东北问题以及日本问题等等。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二日，他亲自介绍中文系教授郑振铎先生讲《一·二八抗战》，郑先生在演说中激昂地说：“我们要努力准备着，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最艰苦的最光荣的最有希望的一次大战，我们要迎上去战！战！战！胜利一定在我们的一边！”这次演说大大激发了全校师生抗战救国的激情。一九三六年四月，梅贻琦针对当时某些学校领导人的逃跑主义思想坚定地说：“本校对于应付时局之态度，可以一言明之，即尽力维持，决不南迁是也。夫国难已至此，然吾人决不可自坏其心理上之长城。大局虽不可知，然而吾人自己之职责，决不可放弃，万一不幸，本校亦当在此‘水木清华’园中，上其‘最后一课’，国家虽弱，正气不可不存。”但梅贻琦对在校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却有自己的主张。他一开始就说：“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又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他的这种救国观必然导致他同当时革命的爱国激流发生冲突。“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就曾以“触犯校规”而开除过学运领袖如黄诚等几名同学，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有的则在民族民主革命战场上为国捐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清华大学，一向被校友们公认为

旧清华的“黄金时代”。这期间，清华大学在大动荡的局面下，反而能在教学、科研、学风、人才等方面创造出辉煌的成果，这是与梅贻琦的努力分不开的。略举数点如下：

一、师资队伍的发展和巩固

清华大学的师资队伍，远在一九二六年梅贻琦任教务长时，就已经初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国文系的王国维、朱自清、杨树达；西文系的王文星、吴宓；物理系的梅贻琦、叶企孙、赵忠尧；化学系的高崇熙、赵学海；生物系的刘崇乐、钱崇澍、虞振镛；历史系的梁启超、刘崇绾、钱端升；数学系的熊庆来、郑之蕃；哲学系的金岳霖、梁启超、赵元任；社会系的陈达；体育系的马约翰、郝更生；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梅贻琦作校长后，首先是“选贤与能，人尽其用”，把全校教师作了统一部署，然后又尽可能罗致国内外学者名流或在学术上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如庄前鼎、刘仙洲、雷海宗、闻一多、章名涛、李仪祉、倪俊、顾毓琇、李郁英、陶葆楷、赵访熊、张荫麟、吴晗、潘光旦、任之恭、段学复、温纳（美籍）、华敦德（美籍）哈达玛（法籍）等，都是他任校长后聘到学校来的。在理论上，梅贻琦高度估计教师的主导地位。长校第一天，他就在就职演说中宣布了他关于教师地位的著名论点：“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反复强调说：“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也图之至极也。”

二、实行“教授治校”（亦称“民主治校”）。他对校事取“无为而治”，或“吾从众”的方针。他的这种谦逊态度得到教

授们一致称颂。名教授张子高曾在一篇文章里，描绘过他的领导方法：“校长分寄其任于诸教授，于各执事；诸教授各执事各尽其责于诸学子，至于因革损益之大端，猝然非常之异变，校长则于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分别与同人共商讨之。每有大计，同人既本其识见之所可及，尽其意量而出之，时或反复辩难，势若不相下，公则从容审夺其间，定其议也，往往各如其意，充然若有得也。”（见张子高一九四八年手稿）。朱自清写道：“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得的。”“他（梅贻琦）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朱自清又说：“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他并不是没有主见的，只看抗战以来，教授会和评议会不得已而暂时停顿的时候，他的种种措施，便可以知道。”（见《清华校友通讯》六卷九期 一九四〇年十月）。

三、在全国工程教育领域里占有相当地位的清华工学院，是梅贻琦一手建立起来的。他一九三一年来校就职，一九三二年二月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面扩展”（见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在纪念周上的讲话）。旋即呈准当时教育部，在原有土木系的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而组成工学院。并从一九三四年夏起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等。这既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前身，又是旧中国航空学科的肇始。他为了

建立工学院的需要，还陆续建成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实验馆、水利工程馆、水利实验室、发电厂等校舍并添置了当时先进的设备，先后聘请了庄前鼎、王士倬、刘仙洲、李揖祥、殷祖澜、史久荣、殷文友、华敦德（以上机械、航空），倪俊、顾毓琇、章名涛、任之恭、李郁荣、赵友民、温纳（以上电机），李仪祉、蔡方荫、张泽熙、陶葆楷、张任、张润田（以上土木、水利）等国内外工程界名流，为清华工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创设了可观的规模。

四、开创与国外学术界联系与交流的先河。一九三三年，首先与德国远东协会交换处及中法文化基金会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先后请来冯卡门（Th. von karman，航空），维纳（Norhert、Wiener，电机、数学）、哈达玛（Jacques Hadamart，数学），华敦德（Frank L. Wallendorf，航空），郎之万（Longevin，物理），狄拉克（P.A.M.Dirac物理）……等国外第一流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

五、扩充学术出版物。除加强《清华学报》等原有刊物外，又创办了《社会科学季刊》、《工程季刊》、《机工月刊》等，这些刊物至今仍是学术界重要文献。

六、创办“特种研究事业”。一九三四年十月，梅贻琦函请教育部同意，陆续兴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三个特种研究所，抗战期间又在昆明兴办国情普查、金属二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研究的项目和成果，在我国学术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清华、北大、南开奉命南迁，三校初于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半年后，又西迁昆明，三校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蒋梦麟